

韩东



西天上

赵启明是知青中最早恋爱的。当然，他的恋爱对象顾凡也最早。她是杨庄八名知青中惟一的女性，如果赵启明想谈恋爱就别无选择。赵启明想谈，而且不能是村上某贫下中农的女儿。或者说赵启明义无反顾地选择顾凡就是为了摆脱他们接二连三的提亲。和这块土地联姻的危险使他不寒而栗。



韩东

西天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天上 / 韩东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6668-7

I. 西... II. 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10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刘志凌
特约编辑 赵志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平文化



世纪文景

西天上

韩东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188,000
版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668-7/I·346
定价 24.00 元



韩东，1961年生，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1988）、《爸爸在天上看我》（2002），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身体》（1996）、《树杈间的月亮》（1997）、《我的柏拉图》（2000）、《明亮的疤痕》（2004）、《美元硬过人民币》（2006），长篇小说《扎根》（2003）、《我和你》（2005），诗文集《交叉跑动》（1997）。

目 录

- 001 描红练习
- 021 树杈间的月亮
- 031 田园四章
- 049 田园
- 063 农具厂回忆
- 081 十把钢丝枪
- 091 富农翻身记
- 109 吃点心，就白酒
- 117 要饭的和做客的
- 133 乃东

145 雷凤英

155 母狗

175 西天上

201 下放地

217 小东的画书

267 古杰明传

301 后记

303 作者年表

描红练习

父亲和来说说话，没有坐的地方，床架、椅子都收起来了。四周立着捆绑好的家具，地板上到处是草绳、蒲包、硬纸板——家具就是用这些东西包扎起来的。母亲泡茶进来，找不到一个地方放下杯子。她左看右看，还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叫小波，已经六岁了，明年就要上小学。我的生日是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家里有六口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和我。爷爷、奶奶都不是亲的。他们是妈妈的爸爸、妈妈。我爸爸的爸爸、妈妈才是我的亲爷爷、亲奶奶。他们不跟我们过。我的亲奶奶叫前三楼奶奶，因为她住在我们家前面一栋楼的三楼。我的亲爷爷叫北京爷爷，因为他住在北京小姑妈家。

家具都不在原来的地方，它们被移到房子中间，背靠在一起。

墙上露出了以前被家具挡住的部分，特别的白、特别的新。要是大间房子都这么白这么新就好了。外祖父把垃圾扫出去，又拧了一个拖把拖地板。小波看见一块块的深红色显露出来。外祖父一面拖一面后退。父亲、母亲，还有来客都让在门外。

“下午就搬了，你还拖它干什么。”母亲说。

前三楼奶奶是在我们家死的。她从前三楼搬到我们家就不应该叫前三楼奶奶了。有好长时间我不叫她。后来爷爷、奶奶让我叫，我就叫她前三楼奶奶。爷爷、奶奶说不行，让我叫她奶奶。我说，那我不就有两个奶奶了吗？爷爷告诉我一个是祖母，一个是外祖母。爷爷还告诉我，祖母就是亲奶奶，是我爸爸的妈妈，是前三楼奶奶。外祖母是外婆或者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奶奶。

家具外面包着蒲包、麻袋、硬纸板，然后用草绳一圈压一圈地捆上去。无论衣柜、书橱、木箱或书捆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体积不等。一样的颜色、外表，一样的四四方方。父母给它们编号，用墨汁写上他的姓名、母亲的姓名和将要抵达的地点。母亲在每件东西上挂很多小标签，内容和父亲写的完全相同。到目前为止再也看不出它们以前是些什么：一律黄灿灿、毛茸茸，支棱着一些小白块（母亲的小标签，用细铁丝系在草绳上的）。那些桌椅板凳、炉具、脸盆、衣架，那些不能包扎起来的東西太让小波扫兴

了。它们看上去还是原来的那副样子，虽然也挂着一两个小标签。

前三楼奶奶死了。是奶奶告诉我的。告诉我以后她不让我想这件事，让我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比我醒得还早。房间里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我想起来了，前三楼奶奶死了。我们家也死人了。去年楼下小兵他爷爷死了，我们家也死了前三楼奶奶。我在床上笑了。妈妈说，小波醒了。她对我说，前三楼奶奶去了。我问妈妈，去了是不是死了。妈妈点了点头。前三楼奶奶真的死了，我们家真的死人了。我问妈妈，我们家死人了吗？妈妈又点了点头。我又笑了。后来我听见奶奶哭看见妈妈哭，我才哭的，他们不哭了我还哭。爷爷告诉我今天不用去上学了，我才又笑的。

在小波的印象中母亲的衣橱是最受重视的东西，上面的穿衣镜上至少垫了两床棉胎。四个人八只手向上举。上面车厢里四个人接（父亲也在其中）。母亲说：“小心，小心。”他们全体都在说：“小心，小心。”

家具在车厢里安放妥当——这需要专门技术：中间加了隔层，空出来的地方尽量塞满，易散的东西用绳子带住。然后，在这一切之上再用一根绳子来回缠绕。

我上小学二年级了。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是红小兵小队长。哥哥上中学，但他不是红卫兵。爸爸说，他的觉悟没有我的高。爸爸还说他自己的觉悟比我高，因为爸爸是大人，哥哥的思想工作应该由他做。但发现问题的还是我。那天哥哥和爸爸下象棋，爸爸先批评了他不该坐在玻璃板上，会把玻璃压坏的。爸爸没有听见他说，毛主席像压坏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故意的。我听见了，想马上报告老师。我哥哥讲反动话了，讲反动话的是我哥哥。我们家也出了反革命。后来爸爸打了哥哥一耳光，对我说我们老师的觉悟也没有爸爸高，哥哥应该由爸爸来教育。

全家被安排去一个部队招待所住宿。住的时候分男女。这样，父亲、外祖父和哥哥就去了另一个地方。小波和母亲、外祖母在一起，与另几个家庭的妇幼合住一个房间。

晚餐就像一次团圆：食堂里，上百个分成两半的家庭彼此呼喊、寻找，终于坐在一起开始吃饭，桌上还有另外一家。半小时以后两家的男人去了他们的住处。两家的女人和孩子也合在一处，她们的话还没说完呢。孩子们的游戏也刚刚开始。

一群孩子去看明天要坐的车。一模一样崭新的大客车，在楼前的空地上排成几排。车头的大红花也是一模一样的。车顶上的三角小彩旗，不多不少都是六十面。车门车窗都关死了。他们搭人梯上去看，里面也都是是一样的：高高的靠背等着他们去坐哩——可就是

要猜猜明天你要坐的是哪一辆？如果你是小波，你就要把小波坐的那辆找出来。

哥哥觉悟不高，但不是反革命，爸爸对我说。爸爸说他是受别人影响，不是本质坏。后来有人来找哥哥玩的时候我就注意听，听他们说什么，是别人影响哥哥还是哥哥影响别人。大头在和哥哥下棋的时候讲反动话，哥哥没有讲。他们一下棋就要讲反动话，上次是哥哥，这次是大头。我知道他们下棋的时候要讲反动话，我就在旁边。他们下棋的时候我不走，我看他们下棋。我记得那天他们下的是海陆空战棋。

日光灯管是白色的，墙壁和被单也是白色的。所有人的脸部都对日光灯反光，看起来更加扁平。外祖母鼻梁的高度似乎也降低了。房间里除了床还是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随身带来的包裹塞在床下。各家都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上晾毛巾。各种颜色的毛巾晾出来，绳子也就显出来了。只有两个床头柜，上面放满各种药瓶、杯子、肥皂盒、发卡、眼镜、手电筒、书本、手纸和零食。一直蔓延到各自的床上。特别是那些女人，小波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她们。也没见过这么老的老太太，比外祖母还要老。坐在床上，一个女人在给她洗脚。为了使老太太的脚伸进水里，女人必须端着瓷盆。虽然父亲、外祖父不在，小波觉得同时有许多家长。哥哥不

在，但小波有许多兄弟姐妹。很多年后，小波从一本书中读到：人类社会是由早期的母系氏族制发展而来的。不禁想起这个招待所之夜——孩子们围着母亲，或者母亲领着孩子围绕着外祖母。喧闹声又一次响起，响起。

哥哥让我和大头下一盘。我把大头下输了。大头比我大五岁，和哥哥一样大。他让我不要把他讲的话告诉别人。本来我已经忘记了。我问他不要把他讲的什么话告诉别人。他把那句反动话又讲了一遍。我问他不要我告诉什么人，他说是他们的红卫兵中队长刘立新，和他一起到我们家来过的。现在我记住了他讲的什么反动话，也知道要报告什么人。大头问我讲了什么反动话。我说你讲中国海军其实不如美国海军。大头说，你也讲反动话了。我说我是学你讲的。大头说重复反动话的也是反革命，我们谁都不报告谁吧。我答应了。后来他又跟我下棋，赢了我两盘。大头说第一盘是故意输给我的，为了不把他讲的反动话告诉别人。他说二比一，他赢了我两盘我赢了他一盘，还是他赢了。我想起来了，他说了两句反动话，我只说了一句。我告诉大头我要报告刘立新。

天没亮他们就起床了。母亲帮小波穿好衣服，他们去院子里露天水池的两侧洗漱，围墙上面只有一颗惟一的星（金星），它的光芒像在针尖上。

父亲、外祖父、哥哥已经等在车门那儿。上车后小波又睡着了。第二次醒来天已大亮，汽车正经过市区。这条线路是事先安排的，两侧都是欢送的人群。他们把所有的车窗摇下，探出身去，不停地挥手作答。有人哭了。小波听见哭声，但找不到哭泣的人脸，因为所有的人都背对车厢朝着窗外。

整个上午汽车都在经过市区。小波一直在摇手。母亲从后面揽着他的腰，手也在摇。有时拿着小波的手，母子俩一起摇。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汽车虽然行进得很慢，但它毕竟在走。所以下面对着他们呼喊，看着他们的人一会儿就转向了别人。小波久久地回顾，直到再也看不见，总无法把他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大部分时间根本没有人对他们看。他看着别人或整部汽车整个车队。他们呼喊、挥手、舞蹈但不是为了他们，不是为了小波。小波找不到他们的目光。再说手也酸了，就让妈妈拿着它们，一只或者两只。母亲知道他们在对谁挥手。

在长江大桥引桥上欢送达到高潮。更多的锣鼓，更多的鞭炮、旗帜和标语。沿途的队伍也更加整齐。母亲对小波说：“这是在欢送我们，是在欢送你，欢送我们每一个人。”——答案的一半。

大头给我冰棒吃，我不要。后来他给了哥哥。我吃的那根冰棒是从哥哥手里拿的，不是大头给的。大头一共给了哥哥两根冰棒，他自己没有吃。大头说我吃了他的冰棒，我说没有。他说他买了两

根冰棒自己没有吃我哥哥吃了一根还有一根是儿子吃的。我说我吃的这根冰棒是从哥哥手里拿的。大头说是他让哥哥递给我的。他说今天电影票也是他买的，战斗片《突破乌江》，他已经看过三遍了。大头问我看没看过，我说没看过。大头问我想不想看，我说想看，但不看他的。大头说又不是他演的。哥哥在旁边说，人家的冰棒都吃过了。电影不看也没有用。我问哥哥，看了电影就不能把大头讲的反动话报告刘立新了吗？哥哥说，那当然，他还说不看电影也不能把大头讲的话报告刘立新了，你吃了人家的冰棒。

车过大桥开始加速。整个车队也拉开距离。小波他们前面那辆车的后部已经缩小，让出的地方可以看见公路和两侧的田野。

小波在识读那些和田野有关的事物：水牛、黄牛、小麦、草垛、磨坊。母亲在教他。但她的农村知识有限，很快就被难倒了。小波换到父亲身边。

由于路基较高，从车上看两侧的原野在下面。景物也变得比实际细小。天空相对更高。当小波获得这样的视野再看车厢里的人觉得不一样了。等他把父亲、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和哥哥看成以前的样子（看回来）后再看窗外，原野又变得新奇。就这样来回看，反复多次。直到双方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

爸爸下楼的时候我喊，打倒爸爸。卫东说不能叫爸爸。叫爸爸

就没有划清界限。卫东说要叫爸爸的名字。我爸爸叫李建宁。李建宁下到二楼的时候我在后面喊：打倒李建宁。我看见爸爸放在扶手上的一只手没有停。卫东说喊的声音太小，爸爸没有听见。我就又喊了一遍，比第一遍和第二遍加起来的聲音还要大。爸爸已经下到一楼，我看见他的帽子和肩膀。爸爸没有停，走出去了。卫东说，你爸爸太顽固，应该把打倒李建宁写在墙上让他看。

中途停了一次车，吃饭、找厕所。车门开着，小波可以随意上下。他不敢离开他们的车太远。公路上停着至少十四辆这样的车，小波无法把它们区别开。向前向后望去，那些车上都有人从车门那儿下来，到了公路上，有人跨过小沟，走到麦田里。那个比外祖母还老的老太太出现了，被人背到小沟那边。她的白发老远就能看见。后来老太太被从草堆后面背出来，又有两个人跨过小沟去接。小波问母亲：“他们干什么去啊？”母亲说：“上厕所。”小波问：“厕所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母亲说：“在草堆后面。”老太太以后，陆续有人去了那边，跨过小沟，转过草堆。小波看见她们半路上开始解裤子，然后提着走过去。草堆后面的人都出来了。又等了一会儿。现在又有人走向草堆，他们不解裤子。小波意识到他们是男的。也就是说刚才上厕所的是女的。女的上厕所的时候男的都在等，他们入神地看着草堆，一面嚼着干粮、喝水或者抽烟。母亲、外祖母去过了，现在轮到父亲、外祖父和哥哥了。小波也要

去，他要看看草堆后面的厕所。突然出现了阳光，把草堆的另一面照得金黄。根本没有什么厕所，没有围墙、门窗、座位或蹲坑。泥地上湿了一大片，低洼的地方蓄满尿液。四周是揩擦过的纸片，有几张纸被风吹着在前面的麦地上跑。

妈妈还没下班，她的单位就来人了，妈妈单位来的人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门上贴标语。我认识妈妈的名字“陆红英”和“打倒”两个字，我知道妈妈也被打倒了。爷爷把妈妈单位的人送到楼梯口，对他们说，好走，下次再来。他用脸盆打来一盆水，把标语旁边的糨糊擦干净。那里没有标语，糨糊把门弄脏了。爷爷又拿来一瓶糨糊，把标语翘起来的地方贴贴好。爷爷用扫床的刷子把标语刷刷平。我们家门上的标语比别人家门上的都漂亮。后来标语旧了，爷爷让我站在凳子上用毛笔把每个字又描了一遍。爷爷说这叫描红练习。

下午四点左右，他们的车停在洪泽湖大堤上。后来开动了，但走得很慢。车队被挖河的民工阻挡。被挖开的路面上搁着木板，车轮小心翼翼地通过。四周的地面被挖开了，完全变了样。小波从来不知道可以向下挖得这样深——甚至比他六岁时街对过煤炭店院子里的防空洞还要深得多（见《掘地三尺》），泥土的颜色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灰黄。也许和当时的光线有关。民工的脊背、脸上和手

臂上也是这种黄色，虽有区别但属于一类。

民工站在下面（汽车两侧），拿着挖河工具（锹、锹、扁担、绳套和箩筐）朝他们看。他们也在看民工。汽车缓缓通过，他们看见连绵数里的民工。民工显然也看见了几十辆汽车和几百扇车窗。这一接触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多年以后小波终于能以民工的立场看待这一遭遇。几十辆车几百扇窗和上千个城里人，还有红花、红旗和各色标语（虽然经过长途跋涉已落满灰尘）。小波完全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站立不动，保持沉默，发出黄光。

现在我家三个好人三个坏蛋。爸爸、妈妈和哥哥是坏蛋。爷爷、奶奶和我是好人。我们家好人坏蛋一样多。后来爷爷也变成了反革命，是历史的，我们家好人就没有坏蛋多了。我们家的坏蛋比好人多两个。奶奶和我是好人，爷爷和哥哥是坏蛋。爸爸妈妈也是坏蛋。爸爸说哥哥觉悟不高，不是坏人，和他不一样。哥哥是觉悟不高的好人，至少能算半个好人。哥哥是半个好人半个坏蛋，有的时候是好人，有的时候是坏蛋。奶奶说，这个好人我不做了，让给你哥哥。奶奶说，我和你爷爷一样，是个坏蛋。她自己要当坏蛋，要当地主婆。现在我家就我一个好人了。奶奶的好人不能让给哥哥。让给哥哥他就是一个半好人了。一个半好人的觉悟怎么还没我高？我才是一个好人。